

清代京官俸禄知多少

◆ 刘玉琪

俸银的规定及花销

清代京官的俸禄，初期沿袭明朝惯例，从顺治四年到康熙八年，清朝统治者对官员的俸禄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后遂成定制。清《户部则例》卷七记载，清朝京官的俸禄，满、汉都一律按品级发放俸银与禄米，具体数额为：正、从一品官180两，正、从二品官155两，正、从三品官130两，正、从四品官105两，正、从五品官80两，正、从六品官60两，正、从七品官45两，正、从八品官40两，正、从九品官31.5两；此外，还发给与银两同数额的以斛计数的俸米。

对于平常百姓来说，这些俸禄自然不少，但是对于花销巨大的京官来讲，这算是低水平的工资了。京官的花销主要包括日常生活、人情来往、犒赏仆从等，其中日常生活花费并不多，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官场中的人情来往了。一年的“三节两寿”（元旦、端午、中秋三节和老师、师母的生日）等加起来，没有个百八十两银子绝对下不来；还有长官、上司、同乡、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，这方面的开销也不小；此外，给官员服务的仆役、轿夫、门房的门包、门茶，一样也不能少；就连本衙门的众多茶房、皂隶、仆役等，也要按节犒赏。除此之外，吉庆吊丧、吃请宴饮也是京官生活中的重要部分，这也是一项为数不少的开销。

清康熙八年，监察御史赵璟上书提出，这样低的薪俸，官员连维持生活都难，为了生存，肯定就会想方设法搜刮下属、贪赃枉法。因此，赵璟建议增加薪俸，但是没有被采纳。雍正元年，京官的薪俸有所增加，下旨给六部堂官“恩俸”，数额与正俸相当，但涉及范围不大。乾隆即位后，才又一次给京官加薪。朝廷下诏，京官不论品级高低，一律按照原俸加倍发放，俸米也按照原数加倍发放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搭

清代的京官是指在京城供职的官员，虽然身居京城，为天子近臣，但是京官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光鲜。与地方官相比，京官的日子过得不是太好，那么，京官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？

上加薪的顺风车，凡院部衙门中的额外官员和候补官员都不能领取双俸。此外，由捐纳出身、分发到各院部的小京官，在3年学习期满之前，一律不给俸禄，其中只有被分发到户部的人才可以领“养廉银”。到了晚清时期，因为财政紧张，又减少了官员俸禄的发放。

地方官员收入一览

那么，地方官的收入又是多少呢？自雍正二年实行耗羡归公后，地方官在正俸之外加发养廉银。养廉银的数量很多，一般是正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；而且是官级越高，养廉银越高。例如，地方总督的养廉银，最少的是四川总督为1.3万两，大多数总督的养廉银为1.8万两，最多的是云贵、陕甘总督为2万两。巡抚的养廉银为1万~1.5万两，布政使为5000~9000两（多数为8000两），按察使多数在6000两以上，道员为3000~6000两，知府为1000~4000两，知县为600~1500两；其他如管河道员为2000~4000两；盐务系统收入最丰，盐运使为2000~5000两，盐法道为2000~4200两，运同、运判都在2000两以上。

两相对比，高下立判。京官的正常收入是根本无法和地方官相比的。一个七品县令的收入多数在1000两以上，同样的七品京官收入却不足100两；高级官员的差别更大，督抚有1.5万~2万两的进项，是同级京官的四五十倍，这就是京官为什么都愿意外放的原

因。以翰林为例，如果3年得到一次担任地方考试官的差事，所得“陋规”能用10年；如果外放学政，节俭的官员能够终身用之不尽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外放做官，各部部曹的机会就更少了。

京官的外快

既然相对来说俸禄较低，为了维持必要的排场和生活，京官就不得不想办法赚点外快。

印结银就是一种来钱的办法。所谓印结银就是通过给同乡签署担保书获得收入的办法，类似“保证金”。印结银究竟源于何时，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，但最晚在清嘉庆时期就已经出现。咸丰、同治以后，由于捐纳盛行，官员的出身比较杂，入京引见的人中也不乏假冒的，吏部不知底细，就要求必须有同乡京官写一个担保，方可掣签分派到各省补用。当然，做担保就意味着承担责任，捐官的人自然就会送一笔钱给京官作为酬谢。后来捐官的人越来越多，久而久之，这笔钱由各省收取，各设印结局，派专员管理，统一分发。对于收入不高、难以外放的部曹来说，印结银是一项重要收入。

然而，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、捐官的数额有很大差别，因此不同省区的官员印结银的收入也相去甚远。寻常省份每年可以得到二三百两；广东、浙江两省富饶，来自这两地的京官每年收入甚至超过1000两。因而，来自南方各省的京官生活相对要奢侈一些。

除了印结银和俸禄之外，京官的收入还



清朝京官上朝

有外官馈赠的别敬、炭敬、冰敬等，这些都是外官逢年过节以取暖费、消暑费、过年费等名目来变相贿赂京官的。外官的高收入则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浮征、加派等非法手段聚敛而来，还有一部分是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——陋规。外官为了防止被告发、尽快调动升迁，就必须要在京官中找知己、结党羽、依靠山、花钱消灾，他们给京官的馈赠自然也就成了常事。此外，凡是京官外放或者外官归京，都要对京官进行馈赠，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规矩。京官每每得知外官入京的消息，就会奔走相告，一起前去拜谒祝贺，趋之若鹜。

但是，这些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京官的庞大支出。京官的人情礼数太多，外官的馈赠和印结银又都是有限的，许多出身贫寒的京官在无奈之下，只好进行借贷，大多数京官都有过长期的借贷史。这样的事情令人惊讶，但的确是事实。清政府禁止放官债，但在巨大的需求下，官债市场还是异常火爆。京官的高消费促使他们绞尽脑汁贪赃敛财，再加之政府检查不力，这也成为当时吏治腐败、贪渎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摘自《百科知识》2015年2月上

共和国记忆

李菁



22.走完了一生

1945年8月19日清晨，刚开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正准备回太行山的刘伯承接到延安保育院来的电话，说大女儿华北出事了。刘伯承夫妇急匆匆地赶到保育院窑洞才知道，头一天晚上，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华北住的窑洞，将华北勒死在床上。不仅如此，凶手还残忍地剖开了孩子的肚子。

看到女儿惨状的刘伯承忍不住地颤抖，头上也渗出大颗汗珠，但他还是强忍悲痛，劝慰已经痛不欲生的妻子。简单地安葬了华北后，刘伯承又奔赴下一个战场。当时大家普遍推测是国民党派特务下的手，目的是扰乱刘伯承的军心——因为刘伯承马上就要指挥与国民党的上党战役。遗憾的是，小华北遇害一案，却一直未能破案。而从某种角度说，生命仅停留在四岁的小华北，也是为一个新政权而失去生命的。女儿的死，是刘伯承与汪荣华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。刘弥群说，父亲晚年经常提起这段事，他会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华北，孩子可惜了……”“我从来没有见爸爸哭过，但是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伤心的神情，我永远都不会忘掉……”回忆起来，刘蒙也不禁陷入伤感。

1965年，刘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了光明，从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。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是刘伯承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，去参加大会时他会忍着不喝水，因为不愿意麻烦陈毅或是别人牵着他上厕所。有时他回来告诉儿子，今天不小心又打碎了个杯子——过去，他可以征服千军万马，而这一次，他却有了征服不了自己身体的无奈。看不见东西后，他对孙子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，但有一天，他对夫人说：“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，我手重，怕捏坏了。”有时他似乎很想和孩子们唠叨些过去的事，不过孩子们觉得，听父亲讲故事的时间还有的是。1973年的一场变故，却让孩子们永远失去了听父亲讲那些老故事的机

会。由于自主神经紊乱，刘伯承出现腿部麻木、睡眠不好等症状，精神科的医生让他服用了一种叫做“奋乃静”的药物，刘伯承服药后却出现拼命想走路、情绪烦躁甚至惊恐等症状。刘解先说，她后来做了很多调查，发现“这是药物造成锥体外系的损伤”，遗憾的是，当时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药物的副作用，错误诊断，反而更大量地使用一种未在中国临床使用过的进口美国药，“不但没抑住病，反正使得整个肌肉不协调，最终连吞咽都困难”。清醒时的父亲对药物产生的不适也倍感痛苦，有一次他甚至大喊：“他们要杀害我！”

刘解先回忆，父亲住院时心肺功能都很正常，“脑子也很清醒”。父亲住在301医院，在这里做医生的刘解先经常抽空陪父亲，刚开始父亲还让她帮自己念报纸上的“要闻”，“有时我一边念脑袋里还想着病人的事，溜号了，父亲冷不丁地追问我报上提到的那个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叫某某，我赶紧找报纸看，可见那时候他脑子还特别好使”。想起这一点，刘解先仍觉得痛心不已。

周恩来说刘伯承的病情后，还特地到医院来看望他。“总理说：‘我来看你了！’他们两人还谈起当年发动南昌起义的事——一个是军代表，一个是参谋长，谈得特别高兴。”刘解先回忆。可是，大量的药物作用下，刘伯承的脑神经一点点被摧毁。提起这些往事，刘解先带着委屈、痛苦，甚至愤怒。从那以后，曾经鲜活的父亲渐渐遥远而模糊，曾经叱咤风云、威名赫赫的“军神”也渐渐远离人们视野。1986年，94岁的刘伯承走完了这一生。

晚年刘伯承对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、气势恢宏的战争并不愿过多提及。孩子们小时候一直好奇地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，他只是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，我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丈夫，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孩子，我心里很不安。”有一次孩子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，想让他看坦克被炸、士兵中弹而死的镜头都是怎么拍的，但是刘伯承还是不愿看。平时在家里，如果看到战争场面，他会立即换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掉电视。他告诉子女，自己不过是走过这些战争的幸运者而已……

十二、神秘的数字与克拉克娜有关？

琳娜李倒是很配合李茗沁在欧洲搜集文物的工作，又根据张笺文提供的号码打了不少电话，还做了记录与整理，其中企业的是多少，私人号码是多少。她还告诉李茗沁，伦敦的曹泰来有一批重要文物，她希望李茗沁直接去找他，说没问题的，曹泰来是她创办的荷兰华侨协会会员。李茗沁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要是能得到，可以给徐楣丽，皆大欢喜。徐楣丽有兴趣，愿意去。李茗沁顺水推舟道，那你辛苦一趟。

这天，李茗沁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踱步，觉得自己这股把徐楣丽支开，有点儿绝情，因为克拉克娜已经决定开一场小型的拍卖会，让李茗沁与太平来争夺她祖上传下来的文物。按理说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徐楣丽应该在才对。要是徐楣丽去伦敦毫无收获，而我在克拉克娜处得到了那批文物，怎么办？

林老板特意来提醒他，第二天的拍卖会会遇到麻烦，这件事传得很快，好多人不希望中国人拿到这批文物。消息果然传得快，刘唐也知道了，打来电话询问。

琳娜李知道徐楣丽一个人去了伦敦，声音顿然像小鸟一般扑哧扑哧飞翔开来，情不自禁叹道，太好了。李茗沁问，好什么？琳娜李邀请李茗沁给华侨协会作个演讲，讲讲中国文化。李茗沁说，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活动，今天要做些准备。琳娜李却说，你辛苦一些，让大伙儿多了解了解中国文化，不是一桩好事？

李茗沁没有料到，他的讲座，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热烈鼓掌。他说到，几百多前的中国制造是高质量、高科技的代名词，那时代表最先进科技文化的中国瓷器，传播世界一千年，带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生产。之所以能这样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兢兢业业，认真制作每一件瓷器，有严格的质量控制。不仅是瓷器，还有家具、漆器、丝绸、茶叶。我们现在要提高产品质量，要向先进国家学习，更要向祖先学习。讲座结束后，大伙聚在一起议论。一个老华侨握住他的手，琳娜李介绍这老华侨很热心，今天这个场地是他的私人会所，他经常免费借给协会开会、举办讲座以及小型集会。老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

华侨瘪着嘴，发着广东腔，说真没有想到中国过去这么强大，以后要好好教育下一代。一个老年妇女说，我听了很惭愧，几十年来，只知道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关心外面的世界，也不关心国家，现在身边正带着一个小孙女，我要好好向她灌输中国文化。不知谁说起了曹泰来，大家又议论开来，说原来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现在看来，他与李先生一样，也在做中国文化

推广的事，组织过多场中国画展，开过中国艺术史讲座。几十号人喝茶聊天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。

协会没有讲课费，但可招待吃饭，李茗沁说免了，琳娜李却一定要请他，不管他同意与否就带他乘上了车，说王子运河边的布兰科餐厅很有名。来到这家餐厅，他才知道别有寓意，通常是情人约会之地。饭店开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，显然要躲避地面上的喧哗。内部装饰为巴洛克风格，花卉、雕塑图案交叉组合，墙面上还挂着油画、毯子，眼花缭乱。桌子上放了一支蜡烛，令李茗沁吃惊，那些烛台也是精心制作的，见得出饭店老板注重细节。听说这家饭店以营造亲密气氛而闻名，看来

此言不虚。上菜速度快，头盘、主菜和餐后甜点，法国风味与荷兰风味交织，他俩喝了一点红葡萄酒，都有点儿晕乎乎。

明天要参加重要的活动，今天真不该喝酒。放松一下嘛，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电话呀！就是你给我的五个数字，后面再添两个，又依次打了一遍，这回换了花样，推销产品、提供信息之类的，或者说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伯伦的家，或者问，是不是古董商蓬皮杜先生家，终于到最后，对方说，你打错了，这儿没有蓬皮杜先生，只有克拉克娜小姐，是古董商。

李茗沁迟疑片刻，几乎要跳起来，是真的？你说说，怎么回事？琳娜李又说了一遍。李茗沁感叹，我要找的就是克拉克娜！有这么巧的事？不一会儿他就冷静下来，还得好好核实。那个蓬皮杜先生呢？还是个谜。

他回到酒店，就担心起来，明天要跟太平争夺那批珍藏，他人脉多，影响又大，无论从哪方面比，我都没有胜算。